



中华思想经典

明夷待访录

【明】黄宗羲 著
段志强 译注

黄宗羲

中华思想经典

明夷待访录

【明】黄宗羲 著
段志强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夷待访录 / (明) 黄宗羲著; 段志强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

(中华思想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07681 - 3

I. 明… II. ①黄…②段… III. ①哲学思想—中国—清代②明夷待访录—译文③明夷待访录—注释
IV. B24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223145 号

-
- 书 名 明夷待访录
著 者 [明]黄宗羲
译 注 者 段志强
丛 书 名 中华思想经典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字数 168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681 - 3
定 价 16.00 元
-

前言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在对儒家政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仅引起过学者的兴趣，更曾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而参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之中，所以它在近代中国人的阅读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一

《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年八十六岁。黄宗羲的一生，正值晚明清初这个剧烈变动的特殊时代，而他又往往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亲身参与过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政治作为还是思想著述，都带着那段历史的鲜明印记，因此他的生命极富光彩，完全有资格成为17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任安徽宁国府推官，天启三年（1623）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宗羲年少时，就在北京跟随父亲读书。当时宦官魏忠贤擅权，朝政把持在阉党手中，而黄尊素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密切，双方斗争十分激烈，黄宗羲也从东林诸君子们



“朝夕过从”与“屏人密商”之中获得了初步的政治经验。天启五年(1625),黄尊素被诬罢官还乡,杨涟等“东林六君子”死于阉党之手,次年,阉党又诬劾黄尊素等七人,遣缇骑抓捕至京,是为“七君子之狱”。就在那一年的闰六月,黄尊素被害于诏狱,死状非常惨烈,给黄宗羲以极深的刺激,也引发了他对明代政治的强烈的批判意识。

崇祯帝登极以后,阉党失势,黄宗羲袖揣长锥,进京诉冤。在与制造冤狱的许显纯、崔应元对簿公堂的时候,他拿出所藏的长锥,刺得许显纯浑身是血,又痛殴崔应元,还亲手杀死了虐杀七君子的狱卒,一时孝名传遍天下。冤狱平反以后,黄宗羲回乡从蕺山先生刘宗周读书,并加入复社,交游颇广,成为江南党社中的活跃人物。不久,阉党又渐渐得势,过去依附过魏忠贤的阮大铖也在南京观望,意图再起。黄宗羲与顾杲两人为首,联合了一百四十名士子,作《留都防乱公揭》痛斥阮大铖,使他终崇祯一朝都没能被起用,但从此也被阮大铖恨之人骨。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随后清军入关,马士英等立福王于南京,建立了南明的弘光政权,这一年黄宗羲三十五岁。阮大铖因为拥立之功而骤起,欲杀《公揭》中人,黄宗羲只得避往家中,而弘光朝廷也迅速败亡。次年,鲁王监国,黄宗羲招募了同乡子弟数百人,驻军江上,号为“世忠营”。此后直到四十岁时,黄宗羲一直在率军抗清,转战江浙一带,先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察御史,失败后又追随鲁王流亡海上,晋左金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只是因为清军要抓捕他的母亲,才不得不返回家乡。临行时,尚书吴钟峦驾着小船相送,两人在海涛声中痛哭而别。

返乡以后,黄宗羲奉母四处迁徙,不遑宁居,同时还秘密参

与抗清的军事，数次遇险，都幸而得脱。顺治七年（1650），黄宗羲的弟弟宗炎因为参与抗清的军事活动而被捕将死，他设奇计，从法场上救得宗炎。不过随着明代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黄宗羲逐渐潜心学问，著书数十种，在很多领域中都有极高的成就。除了《明夷待访录》之外，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今水经》等，所涉遍及经史子集、九流百家，还编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海》等几部大书，对于南明史事的记述也都极有史料价值。康熙皇帝曾经征召他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但是黄宗羲拒绝了，只同意以通信的方式参与《明史》的修撰，史局的大关节都征求过他的意见，其中的《历志》更经过他亲自审定。

黄宗羲在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錡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全祖望在为黄宗羲作碑传的时候也说他“始为党錡、后为遗逸”，中间则是“陵谷崎岖”，都很能概括他的人生经历。不过，以上所述仅仅是个概要，具体事迹可以参看本书所附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那是清代学者全祖望的一篇力作，不仅记述黄氏一生行迹非常详尽确实，而且笔力、识见俱佳，颇能传达传主的风采。

二

在黄宗羲的著述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是检讨明代灭亡的原因，其成果就是这部始作于康熙元年（1662）、次年完成的《明夷待访录》。根据全祖望的说法，黄宗羲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写出这样一本为后世作法的著作，是因为南明政权的彻底败亡。

崇祯死难以后，朱明宗室在南方还延续了数个政权，到了康熙元年，南明只剩下逃往缅甸的永历皇帝和在台湾受郑氏家族庇护的鲁王。而这一年的四月，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五月，郑成功病死，恢复明朝的希望终于落



空。《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恰在此时，两者之间的关联似乎顺理成章。

不过，按照黄宗羲自己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记述，他在康熙元年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以后，因为遇到火灾而中止。黄宗羲所居的龙虎山堂失火是在那一年的二月，所以他开始写作的时间应当是康熙元年的年初，而那时永历和郑成功都还在世，可见，即使后来《明夷待访录》确实有着复明无望而为后世制法的意思在内，那也未必就是促使作者开始写作的初始动机。

更何况，与《明夷待访录》内容近似、形式也一致的《留书》，就写于十年前的顺治十年（1653），所以尽管黄宗羲的著述一定会与明清之际的时局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对明代政治的总结与思索决不始于南明的覆亡，而应当是在明清易代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自然反应，是长时间萦绕胸中的问题，《明夷待访录》的完成只是这种思索的结果而已。固然，这部书的写作可能有其具体的触因，但它所面对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只能放到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巨大变局之中来理解。

天崩地解，这是当时人描述时局常用的一个词。它所指称的，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和异族入主，更与晚明那个特殊活跃的时代不无关系。

明代自万历以后，由于政治控制的放松、城市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文化的繁荣，再加上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历史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新特征。在思想领域，阳明之学传衍流行，在阳明后学中广泛出现了肯定私利和欲望的思潮，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正统意识形态构成巨大的挑战；在经济领域，工商业空前发展，私人占有的财富大量增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争

夺也随之激化，尤其在矿税等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矛盾；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是皇权高度集中，附着于皇权的宦官成为政治的毒瘤，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乃至在野文人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双方彼此角力，晚明政坛给人以十分焦虑而紧张的感觉。

在晚明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杰出的人物，风气似乎也十分自由，社会成了各式思潮和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但是，在正统儒家的观念看来，这种自由和多样，其实只是衰世的“乱象”，是不足为训的，而明代的亡国，就是“乱象”的顶峰。这样，入清以后对明亡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同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剖析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良好政治的新标准，二是回答晚明提出的新问题，重构社会秩序，重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就是《明夷待访录》所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在同时人的笔下都称作“《待访录》”，例如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就称“大著《待访录》”，黄宗羲自己也多称“《待访录》”。不过，在后人辑出的《〈留书〉题辞》中，黄宗羲也提到了“《明夷待访录》”的名字，而且《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也就“明夷”作了发挥，所以我们可以不管《明夷待访录》是否原名“《待访录》”，“明夷”仍可算作黄氏的自题。

“明夷”是《周易》的第三十六卦，卦象坤上离下，孔颖达疏：“夷者，伤也。”意思是光明受到了挫折和压制。《序卦》又说：“明夷，利艰贞。”是说君子在面对明夷的境况之时，应当“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程颐《伊川易传》）。黄宗羲是易学大师，他用这一卦来表示身处新朝而持正守节的遗民立场，其用意应当是很清楚的，至于有人推测说“明夷”二字暗指明朝亡国等等类似说法，我们虽不能证其必无，却过于深文，尽可不作此想。

再说“待访”。“待访”的说法来源于周武王访问殷商遗臣箕子，箕子陈述了治国的方略而为武王所接受，本书既名“待访录”，那么作者究竟想



要“待”谁人之“访”，立刻就成为一个问题。

一种说法认为，身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其实是在等待着清朝君主的来访。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乾隆时候的全祖望表示过赞同，后来章太炎、陈寅恪等也持此说，章太炎并且写了《非黄》，虽说实际上是一篇讽刺政敌的政论，表面上却拿黄宗羲的气节问题大做文章。许多人并结合黄宗羲入清后的一些表现，例如他虽然身不仕清，却并不禁止门人子弟入仕为官，也与不少清朝官员往来密切，甚至还曾称康熙为“圣天子”等等，来证明他的“待访录”其实是在为清帝“上条陈”。另外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则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后的王者。还有一些学者推进了梁启超的推测，并将“代清而兴”者具体为郑成功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黄宗羲在写作《明夷待访录》的时候，根据胡翰“十二运”的说法，认为二十年后将会迎来治世，而且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个治世，可望恢复“三代之盛”，他的这部书正可作为治世的为政纲领，而起到与箕子为周室陈述大法相同的作用。对于“十二运”，黄宗羲恐怕也是宁愿信其有的态度，总之是渴盼太平盛世的来临，而未来的治世不仅应当驱除异族的统治，更要取消战国秦汉以来的弊政，实现儒家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至于创造这个治世的人物具体为谁，其实并不重要。

探查某部作品的写作意图往往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不仅因为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想法经常讳莫如深，有时还故意制造假象，令后人难以捉摸，更因为即使是作者本人，在著书之时也未必就一定有十分明晰而确切的指向，即使有，也可能会时时变动。所以，对于像《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作品，我们能够领悟到

作者在乱世中期待善治、在困境中发愤著书的苦心孤诣即可，似乎不必执着于类似“《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这种聚讼不已的问题。

三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之前流传不广。梁启超曾说此书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但是现存的几种禁毁书目里面都没有著录，依梁氏不拘小节的著述风格，大概是他误记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假如清朝官方能够得到这本书，那么它一定不会幸免于“全毁”的命运。

到了晚清，随着政治改革的讨论日益公开而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中心议题，《明夷待访录》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较早的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就有《原君》、《学校》等篇目，议论虽不尽与黄宗羲相同，但受到《明夷待访录》的影响则是肯定的。此后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家如孙中山、陈天华，乃至清朝大臣如张之洞，民国枭雄如蒋介石，都对这部书称扬有加。自然，也有不少人站在绝对君权的立场上对《明夷待访录》口诛笔伐，唯恐其成为“平权自由”的“借口”。尤为重要的是，它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起过催化的作用，而且被应用到实际的政治斗争当中，成了新型政治理念的宣传品。梁启超说他们在鼓吹维新的时候曾经将《明夷待访录》节抄散发，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动革命。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史上如此风行，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定位简直是五花八门，争论至今未息。政治家对它的解释，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可以不论；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一部“民主主义”的作品，因此具有“近代”或者“启蒙”的色彩，一种则认为它虽有思想上的突破，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许的范围



之内。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究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应当朝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发展,而“现代”和“传统”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只有突破了传统,才有可能到达现代。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只是在于《明夷待访录》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什么位置:是仍然停留在传统之中,还是已经开始过渡到现代?说到底,都是在“现代化”的坐标系里打转转,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论和框架的束缚,尤其不必戴着西方眼镜来观察这部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

历来研究《明夷待访录》的人,多注意它的前五篇,也就是《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和《学校》;于此五篇之中,又复有所选择,凡是那些反对皇权专制、鼓吹士人议政的说法都被反复引用,并被标举为作者的“理论突破”,而与现代社会不甚相符的,则往往略而不提,可能是怕有玷黄宗羲的令誉。假如梨洲先生地下有知,会对这种剪裁取舍领情么?

我们先引《学校》篇的一段话: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显而易见,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权力对文化的控制,也是古文、语录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对小说、词曲所代表的市井流行文

化的侵夺。站在崇尚思想自由、鼓励文化多样的“现代”立场上，黄氏的观点委实难以接受，也与他“启蒙思想家”或者“民主先驱”的头衔不相匹配：这就是“本土资源”与“外来概念”的圆凿方枘之处。

《明夷待访录》对异端的警惕和严厉态度，首先来源于明代遗民心目中的亡国教训，他们大多认为，晚明过分嘈杂的言论和多歧的思想应当为明代的灭亡负起责任，所以一个好的政权应当使社会文化始终在正统的轨道上运行；其次，强调思想权威的重要也是儒家的一贯思路，文化由国家统一控制尤其合乎《周礼》的精神。

话又说回来，同样是文化控制，黄宗羲的设想也有他独特的价值，比如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不许传刻”和“追板烧之”的决定究竟由谁作出和执行，不过推想起来应当是太学和地方学校。把管理文化的权力交给学校而不是政府，事实上是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文化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十分契合作者所构想的国家体制，也大大优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

以上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用来说明读《明夷待访录》应当首先从作者著书的语境和儒家的立场出发，既不必用现代/西方的概念为古人贴金，也不应以后人的观念指责前贤。黄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现的思想界“彗星”，《明夷待访录》明显地有着孟子、苏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迹，与作者约略属于同一时代的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过与《明夷待访录》相近似的许多观点，所以黄宗羲只是灿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较为明亮的一颗，既无所谓“突破传统”，也无所谓“走向近代”。

秦汉以后，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不少儒者渐渐沦为权力的附庸，乃至甘心做皇权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黄宗羲一概斥之为“陋儒”。《明夷待访录》从政治权力的本质入手，重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



民之忧乐”等等，这些思想都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足以成为普遍的规则，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运转、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民的生活富足为目标。如果《明夷待访录》与西方的某些政治观念相通，只能说明人类在面对同样问题、追求同样价值的时候，会进行相同或者近似的思考，《明夷待访录》能够接触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以儒家的方式提出了有见地的回答，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明夷待访录》现存最早的本子是乾隆间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题作《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这也是后来所有刻本和排印本的祖本。本书即以这个本子为底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明夷待访录》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的整理成果。另外，为了帮助读者省去一部分翻检之劳，书后附了一些相关材料，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宗羲的传记，还值得专门介绍一下的是《留书》。

《留书》作于顺治十年（1653），原本有八篇，除了这里的五篇之外，还有《田赋》、《制科》、《将》三篇，《明夷待访录》即是在《留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后来在刊刻《明夷待访录》的时候，原属《留书》的五篇由于充斥对“夷狄”的指斥，恐触忌讳而被剔除，其余三篇则已经被吸收到《明夷待访录》的相关篇目之中了。这里根据《黄宗羲全集》的整理本全文收入，并改正了几处标点上的错误。

此外，还附有谭嗣同、梁启超、钱穆、萧公权、萨孟武等几位政治和学界人物对《明夷待访录》的解读，各家之言不尽相同，

正可提供不同的认知角度,更加全面地理解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单从字数上看,《明夷待访录》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背后有着复杂的思想与历史背景,这里所加的注释除了解释文意之外,还试图尽可能地还原作者论述的语境,尤其是明代的制度和史实,注释往往不厌其详,其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的地方。译文和注释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段志强

2010年8月6日

目录

前言	1
题辞	1
原君	6
原臣	14
原法	21
置相	27
学校	37
取士	55
取士上	55
取士下	64
建都	79
方镇	85
田制	92
田制一	92
田制二	99
田制三	105
兵制	117
兵制一	117

兵制二	125
兵制三	132
财计	139
财计一	139
财计二	150
财计三	159
胥吏	163
奄宦	172
奄宦上	172
奄宦下	177

附录一

留书	181
自序	181
文质	182
封建	186
卫所	191
朋党	194
史	198
留书题辞	202

附录二

全祖望跋	204
顾宁人书	205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	207

附录三

谭嗣同《仁学》	23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3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4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245
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	257